

還我土地正義：從烏坎事件觀察農民維權運動

林佳樺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2011年9月21日，廣東省陸豐市的烏坎村發生農民維權抗爭運動，這場維權運動成爲中國社會運動的一個指標，抗爭運動的後續影響也廣受注目。這次到廣州市，與中山大學政治學所吳方彥和行政管理學所汪廣隆兩位博士生交流，吳方彥從經驗現象觀察烏坎村事件中抗爭者的角色與行動，並持續關注抗爭事件的後續發展；汪廣隆則是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政府維穩的思維邏輯。他們各自從政府與抗爭者這兩個不同脈絡來分析維權運動的現況，並以烏坎村事件作爲當代中國抗爭的經典成功案例來印證和檢視抗爭政治的理論，最後更進一步指出未來仍可以繼續從事的抗爭運動研究面向。

烏坎事件後續發展

吳方彥關注烏坎村事件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也曾經在烏坎村做過田野觀察，目前仍持續追蹤後續的發展。他認爲烏坎村事件在當代中國的抗爭事件中，具有相當大的代表性，烏坎村事件在組織化、策略化和媒體運用上都做了全面的新創舉，尤其是年輕人的加入成爲新動能，使得烏坎村事件有了不同於以往的結局和發展。年輕人爲失去生機的烏坎村裡萌發新的生機，他們創立「烏坎熱血青年團」QQ群，向網民們發送烏坎村的最新動向、號召全國的注意力，也獲得海外媒體的關注。在組織化與策略化上，烏坎村民自組村委會，以村民選舉推派村委代表，在當代中國抗爭歷史上是一項新創舉，並且成功獲得地方政府的承認。在2011年9月的抗爭行動中，他們

動員了五千位村民向地方政府抗議，也成功地吸引全球的目光，政府更在同年十二月有了前所未有的讓步妥協。¹

烏坎村事件一週年後，年輕人的力量漸漸邊緣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年紀更長的村民領導者主導後續事件的發展，而烏坎村事件也有了不同的變化。首先是抗爭事件的領導者成爲村委會幹部，從抗爭者變成自利者，打天下的人一轉眼成了坐擁天下者，居民們難以接受；尤其是在事件過了一年之後，村裡的土地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失望和憤懣交織之際，居民們把對地方政府的不滿轉嫁於村委會幹部，這是烏坎村當前面臨的問題之一。除了抗爭事件的領導者與居民的問題之外，領導者內部也出現了紛爭和歧見，領導們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各自坐擁山頭的情勢，宣告烏坎村團結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小了。

吳方彥認爲，以一個經典的個案來看，烏坎村仍存有許多不穩定性，這些不穩定性來自於土地和治理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然而烏坎村事件



吳方彥從經驗觀察出發，關懷農村土地與維權運動。

1 左翼 21 (2011)，打倒貪官、還我土地！聲援烏坎人民抗爭、齊齊踩去中聯辦！<http://left21.hk/wp/2011/12/statement-2/>

作為中國抗爭政治的經典案例仍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經濟改革矛盾下的土地爭議

中國的農民與土地息息相關，在城鄉二元體制特色下，城市居民可以擁有國家的保障，農民則是倚靠農村集體的生活模式與家庭聯產承包制，這些都加深了土地對於農民的重要性。然而，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大搞建設，誠如北京奧運、世界博覽會都需要龐大的資金，這些財政的缺口通通轉由地方政府來彌補，而地方政府從中央獲得的補助不多，也沒有多餘的財政可以支援中央，因此地方政府只好將財政的缺口再度轉向於農民，剝奪農民的維生工具——土地。

經濟改革也帶來了城市的繁榮，在城市裡生了根的市場力量逐漸蔓延至城市周圍的農村，都市化擴張的速度愈來愈快，城市的土地不夠了，但是城市的房子和人口仍不斷地湧現，尋找更多的土地成為當務之急，因此農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徵收了，農民被迫上樓、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農村集體的生活網絡。

農民作為中國社會裡失落的群體，又失去了賴以維生的土地，這些不滿和困頓都將矛頭指向地方政府。農民打著維護應有權利的旗幟發起集體行動，在烏坎事件中可以看見「打倒貪官」、「還我土地」、「請中央救救烏坎人民」等標語羅列，²農民期待著中央政府介入、嚴懲地方貪官汙吏，還給他們應有的土地正義。

農民的維權，政府的維穩

農民產生維權概念的同時，政府也祭出了「維穩」的思維。為何政府要「維穩」？汪廣隆提到，這與經濟轉型的社會矛盾有關。中國身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威權體制，不容許社會動盪

與不安定，況且除了國家體制之外，沒有任何合法性的基礎可以維護社會秩序，因此政府就成了維持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推手，這就是政府維穩的由來。關於政府的維穩策略，汪廣隆提出四種不同的類型，包含民事糾紛、刑事問題、政治問題與治安問題。面對不同類型的紛爭，政府部門有不同的應對方式，而且同一個事件的發展在不同階段也可能有不同的分類，像是烏坎村事件，一開始可能作為普遍的土地和補償金的問題，後來事件的規模擴大，牽動了媒體與中央政府，騷亂受到各界的關注，烏坎村事件就不再是單純的土地紛爭，而是一個治安問題與政治問題了。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維穩，不同層級的政府有不同的思維模式，但是在抗爭者的眼中，地方政府直接面對群眾，所有的不滿與指責都瞄準地方政府，人民的心中認為中央政府是「善」的，是人民的保衛者，而地方政府是「惡」的，應該受到懲罰。民衆的反應在烏坎村事件中有很直接的呈現，像是烏坎村民在集體行動中所拿的標語，標語上的字字句句都針對地方政府的違法亂紀、瀆職和濫權表達不滿，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村民們期待中央政府看見他們的苦痛和孤零的心聲，這些話語反映了人民對於中央和地方有著「差序政府信任」（李連江 2012）³的觀念。

探討過去中國政府一貫的維穩思維，不外乎是採取壓制手段，然而烏坎村事件開創出政府維穩思維的另一條思考道路，無論是從抗爭者的行動策略，或是從政府治理的角度審視之，烏坎村事件有許多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地方。

走出抗爭行動者的思維框架

近來研究中國農民維權運動和勞工抗爭運動的研究十分豐富，尤其是站在抗爭者視角的研究非常多元，像是抗爭行動者的行動策略、所使用的話語等。然而，除了以抗爭行動者的角度思考

2 沈達明(2011)BBC 中文網，大家談中國：烏坎啟示—中國當代農民抗爭的里程碑。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omments_on_china/2011/12/111221_coc_wukan_final.shtml

3 李連江(2012)，〈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31: 108-109。



與廣州中山大學博士生交流座談，拓展彼此的學術視野。

土地與維權運動之外，還有什麼尚未被開發的研究方向嗎？汪廣隆認為，從政府的角度看維權與維穩是目前缺乏的研究方向之一，相關研究並不多見，甚至幾乎是空白一片。這是因為要進入中國政府進行田野研究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尤其對台灣研究者來說更不容易。汪廣隆提供三種進入田野的方式：包含實習、申請國內外項目幫助，以及依靠非正式關係。

除此之外，性別研究也是在這次交流座談會中激盪出來的新的研究方向之一。以性別研究的微觀行動機制來分析與觀察農村的土地爭議、抗

爭領導者的性別差異，以及農村婦女組織與土地利用等等，都是在目前有關維權運動和土地的主流討論底下較少受人注目的研究視角。

在這次的學生交流座談中，使我對於農民維權運動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也對政府維穩的思維有了宏觀的概念，這些從前人得來的研究成果將會成為我未來田野土地上的知識種子，這些種子正在默默地發芽成熟，等待我收割的那一天。我也期待著，中國農民的土地正義，無論以何種形式，終有一天會實現。